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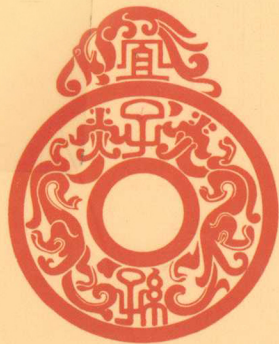


增订文心雕龙校注

〔南朝梁〕刘勰 著

黄叔琳 注 李 详 补注

杨明照 校注拾遗



中 华 书 局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增订文心雕龙校注

〔南朝梁〕刘 勰 著

黄叔琳 注 李 详 补注

杨明照 校注拾遗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增订文心雕龙校注/(南朝梁)刘勰著;黄叔琳注;李
详补注;杨明照校注拾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3
(中华国学文库)
ISBN 978-7-101-08526-6

I. 增… II. ①刘…②黄…③李…④杨… III. ①
文学理论-中国-南朝时代②文心雕龙-注释
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8198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|
| 著 者 | 〔南朝梁〕刘 勰 |
| 注 者 | 黄叔琳 |
| 补 注 | 李 详 |
| 校注拾遗 | 杨明照 |
| 丛 书 名 | 中华国学文库 |
| 责任编辑 | 郁震宏 朱兆虎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22 $\frac{1}{8}$ 插页 2 字数 42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8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8526-6 |
| 定 价 | 53.00 元 |
-

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的出版缘起,要从九十年前说起。

1920年,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,开始编纂《四部备要》。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,精选经史子集的“最要之书”,校订成“通行善本”,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。一经推出,即以其选目实用、文字准确、品相精美、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,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、阅读典籍的需要,广受欢迎。丛书中的许多品种,至今仍为常用之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。六十餘年来,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,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,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,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,为学界所必备。

同时,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,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——国学,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,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,普惠全人类,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。当此之时,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,实为当

务之急。于是,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应运而生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是我们追慕前贤、服务当代的产物,因此,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:

一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最要之书”。举凡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科学、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,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,皆在此列。

二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“最善之本”,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。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,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,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总之,不以新旧为别,惟以善本是求。

三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以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刊印。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。时至当代,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,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。《文库》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,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将逐年分辑出版,每辑十种,一次推出;期以十年,以毕其功。在此,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、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。

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,至今已近百岁。我们将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,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、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。我们自当努力,让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得起这份重任,这份荣誉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0年12月

前 言

—

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，内容最丰富、体系最完整的，当推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了。可是关于作者的生平事迹，史书的记载却语焉不详。为了有助于读者知人论世，姑作如下简介：

刘勰，字彦和，大约出生于刘宋泰始二、三年（公元四六六—四六七年）间。祖籍原在东莞郡莒县（今山东莒县），永嘉之乱时，他的祖先南奔渡江，从此世居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。京口本为南朝重镇，又是人文荟萃之区，先后在这里讲学的著名经学家、史学家有关康之、臧荣绪和诸葛璩等人^{〔一〕}。流风遗韵，对刘勰可能有过某些影响。

宋齐禅代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，使原来显赫一时的刘穆之、刘秀之的子子孙孙，政治地位不断下降；刘勰的一家，更是又逊一筹了。他的祖父刘灵真尽管是宋司空

增订文心雕龙校注

刘秀之的弟弟，却没有当上官，父亲刘尚也只任越骑校尉，这与史传所说的“家贫”，是不无关系的。

早孤的刘勰，并不因为无人管教和家道中落而放松学习，却自觉地笃志好学。所读的书，大概不外儒家典籍。他的儒家思想，也从此扎下了根。但在佛学甚嚣尘上的当时，刘勰却曾受其影响而不婚娶。这是一时的风尚，不止刘勰一人为然。比他早的如周续之，同时代的如刘歊、刘讷，家境都很优裕，就是由于信佛才没有结婚的〔二〕。而且周续之“通五经”、刘歊“六岁诵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”〔三〕，还是儒家信徒哩。

另一种风尚是，从后汉末期牟子的《理惑论》出现以来，儒佛合炉共冶的倾向已日益普遍。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，除照例肄习儒家经典外，为了适应潮流，以利于向上爬，都爱到寺庙去跟和尚们打交道：有的是谄戒范〔四〕，有的是听内典〔五〕，有的是考寻文义〔六〕，有的是瞻仰风德〔七〕，有的则住在寺里读经论，明佛理〔八〕。寺庙广开，投身接足者颇不乏人〔九〕。本已信佛而又笃志好学的刘勰，自然是闻其风而悦之的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中，钟山上定林寺〔一〇〕是名列前茅的。自刘宋元嘉十二年（公元四三五年）昙摩密多建寺〔一一〕以后，高僧辈出〔一二〕，而又由于“士庶钦风，献奉稠叠”〔一三〕和“获信施”〔一四〕，饶有资财，富于藏书。“埒美嵩、华”的钟山和“郁尔层构”的“禅房殿宇”〔一五〕，也是无车马

喧的读书胜地。刘勰为了获得一个比家里条件更好的学习环境，专心致志地攻读若干年，“穷则独善以垂文，达则奉时以骋绩”（《文心雕龙·程器》），上定林寺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；同时也是他希图走入仕途的终南捷径。

上定林寺的方丈释僧祐，是当时“德炽释门，名盖净众”^{〔一六〕}的大法师，白黑门徒多达一万余人^{〔一七〕}。笃志好学的青年刘勰前去投依，是送上门的难得助手，僧祐当然是欢迎的。这样，刘勰在与僧祐居处的十馀年中，除了刻苦阅读释典外，经史子集必然也在钻研之列。因而“博通经论”，“深得文理”。不但编定了寺内所藏的经藏和撰述一些“会道控儒，承经作训”^{〔一八〕}的论文，而且还写成了不朽的著作《文心雕龙》。

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（公元五〇一一—五〇二年）间^{〔一九〕}，由于和当时弥漫文坛的形式主义文风异趣，曲高和寡，不为人们所重。刘勰坚信自己著作的价值，决定请一代文宗沈约品定。这时沈约官居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炙手可热。社会地位低下的刘勰无从自达，只好装成书贾的模样，守候在路边，等待沈约的车驾经过，便上前推销颇为自负的著作——《文心雕龙》。沈约读后，大加赞赏，认为“深得文理”，置于案头，以便随时观览。刘勰在《知音篇》里曾慨叹知音难逢，而这一别开生面的自荐，却逢其知音了。从这里也就不难看出，刘勰从政之心何等强烈。否则书成之后，即使不为人们所重，

增订文心雕龙校注

大可藏之名山，传诸其人，又何必作货鬻之状，干沈约于车前呢！

多半由于沈约的荐引，刘勰在天监（梁武帝萧衍受齐禅后年号）初起家奉朝请，从此踏上了仕途。他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，车骑仓曹参军，太末（今浙江衢县）令，步兵校尉，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务。任太末令时，“政有清绩”，可见他是具有“工文”“练治”的才能的，也是他“奉时骋绩”的具体表现。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，受到当时另一位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的“爱接”，他们共同讨论篇籍，商榷古今的情况，是不难想见的。萧统选录的著名文学总集《文选》，与《文心雕龙》的“选文定篇”（《序志》）多有契合之处，恐怕不是偶然的。

佞佛的梁武帝于天监十六年（公元五一七年）十月飨荐改用蔬果之后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。刘勰认为改革不够彻底，便于次年八月后上表，建议二郊农社也应只用蔬果。这自然是他的佛教思想有所抬头的反映，但也可能有希图升迁，得以进一步发挥其才能的打算在内。到了中大通三年（公元五三一年）昭明太子一死，东宫旧人例不得留，刘勰既未新除其它官职，奉敕与沙门慧震于上定林寺撰经，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吧。任务完成，他便请求出家，并先爇鬓发以表示决心。被批准后，就在该寺当了和尚，法名慧地。无可奈何的归宿，不到一年光景便去世了。这时大约是梁大同四年或五年（公元五三八—五三九年）。刘勰一

生历宋、齐、梁三世，计得七十二三岁。在南朝文学家中，像他这样的高龄，还不多见。

史传说刘勰“为文长于佛理，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，必请勰制文”。可见他在当时是负有盛名的作家。惜其文集早已失传。现在除了《文心雕龙》以外，只有《灭惑论》和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两篇保存了下来。

刘勰在《序志篇》里叙述写作《文心雕龙》的动机，是由于梦见自己拿着丹漆礼器，追随孔子南行，因而感到非常高兴。本想“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”，可是“马（融）、郑（玄）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”；好在“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……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”。这才搦笔和墨，选择了论文之一途。在刘勰看来，“论文”与“注经”都属于“敷赞圣旨”，是殊途同归的，跟马、郑诸儒一样地足以“立家”。

这种古文经学派的立场，使刘勰不满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学。据裴子野《雕虫论》所述，宋齐以来的文学状况是：“自是闾阎年少，贵游总角，罔不摈落六艺，吟咏情性。学者以博依为急务，谓章句为专鲁，淫文破典，斐尔为功，无被于管弦，非止乎礼义，深心主卉木，远致极风云。其兴浮，其志弱，巧而不要，隐而不深，讨其宗途，亦有宋之遗风也。”刘勰认为这是文学背离了儒家原则的结果。他在《序志篇》里说：“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”《通变篇》也说：

增订文心雕龙校注

“矫讹翻浅，还宗经诰。”《文心雕龙》就是为了矫正这种离经叛道的文风而写作的。

由于刘勰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，所以他用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三篇来笼罩《文心雕龙》全书，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：“道心”是文学的本原，“圣人”是立言的标准，经书是文章的典范。这种儒学的教条既有反对唯美主义文学的一面，又有着很大的局限和缺陷。不过，“论文”毕竟不等于“注经”，《文心雕龙》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，对大量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，这是不能简单地用儒家思想来包括的；《文心雕龙》的卓越贡献也正在这里。

当然，刘勰的思想是复杂的，有矛盾的。既业于儒，又染于佛，在他的头脑里，儒佛两家思想都有。但二者之间既不能划等号，也不能看成永远是铁板一块，而是此起彼伏，互有消长的。当他在撰述《文心雕龙》之前写《灭惑论》时^{〔二〇〕}，佛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，即是说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佛学的唯心主义思想，他必然站在佛家的立场上，对“谤佛”的《三破论》予以还击，旗帜鲜明，毫不含糊。当他梦见孔子后写《文心雕龙》时，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，即是说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儒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，他又必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，来“述先哲之诰”，持论谨严，自成一家。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，时间既不相同，内容亦复各异，因而刘勰在《灭惑论》和《文心雕

龙》中所表现的思想判若天渊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里还须指出，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，所原的“道”，所征的“圣”，所宗的“经”，皆中国所有；所阐述的文学创作理论，所评鹭的作家、作品，亦为中国所有。与佛经著作或印度文学都无直接间接关系。所以全书中找不到一点佛家思想或佛学理论的痕迹，而是充满了浓厚的儒学观念。这固然可以看出刘勰著书态度的严肃，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《文心雕龙》本身的内容所决定。至于全书文理之密察，组织之谨严，似又与刘勰的“博通经论”有关。因为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，无疑是受了佛经著作的影响的。

《文心雕龙》是刘勰惨淡经营的巨大成果，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岿然屹立的高峰！

二

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是从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部杰作。全书由五十篇组成，分为上下两编，约三万七千馀字。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，下编则为创作论、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。结构严密，体大虑周，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。列宁曾说：“判断历史的功绩，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，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。”〔二〕我们按照列宁的教导来衡量刘勰，

增订《文心雕龙》校注

那他在《文心雕龙》中的确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,不愧是我国最优秀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之一,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探讨。

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,刘勰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,在这种反映中也浸透了作家的主观感情。

《物色篇》说:“岁有其物,物有其容;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。”《明诗篇》也说:“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,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”文学创作的对象是“物”,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引起了人们感情的波动,才发而为文辞。这种物——情——文的公式,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。刘勰要求这种反映尽可能地真实:“写气图貌,既随物以宛转;属采附声,亦与心而徘徊。”这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宛转入微地刻画客观事物的面貌,委曲细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。他说:“吟咏所发,志惟深远,体物为妙,功在密附。”把表达作者情志放在第一位,而把刻画事物形貌放在第二位,因而不满足于“近代以来,文贵形似”(《物色》)的倾向。但这并不是反对文学创作不应该“形似”,而是反对片面追求“形似”的形式主义文风。

8

以上是就描写自然景物而言。当然,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对象还是描写人们的社会生活。刘勰说: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(《时序》);“是以师旷觐风于盛衰,季札鉴微于兴废”(《乐府》)。这就是说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、时代面貌决定的,因为文学就是社会和时代的反

映。所以他分析建安文学说：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（《时序》）这一段论述，是从建安文学和那个动乱时代的关系着眼，所以能精辟地总结出建安文学的特征。刘勰的这些观点，继承了自《礼记·乐记》和《毛诗序》以来我国文论的优秀传统。

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，刘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，要求文学为封建制度服务。

《征圣篇》发挥了儒家论文的传统主张，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纳为三点：“政化贵文”、“事迹贵文”和“修身贵文”。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到了极高的地位，《序志篇》对“文章之用”说是“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”；《程器篇》也说：“摛文必在纬军国。”这种对政事教化的强调，也贯穿在文体论各篇中，如《议对篇》要求对策能“大明治道，使事深于政术，理密于时务”；《书记篇》指出“书记所总”的二十四种“艺文末品”，为“政事先务”。正因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，在所评论的作品中，除了一些应用文外，还有学术著作。这是由于他的广义的文学观念使然。比起萧统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（《文选序》）的选文标准，就显得瞠乎其后了。

刘勰的这些观点，表现了儒家思想封建保守的一面。不过，当时文坛上占主流的形式主义文学，完全抹煞了文学的社会功能，堕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。刘勰反对

“近代文人，务华弃实”（《程器》），也并非没有积极的意义。

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，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，形式表现内容，要求作品达到二者的统一。

《情采篇》说：“夫水性虚而沦漪结，木体实而花萼振，文附质也。”这是比喻一定的形式（“文”）是由一定的内容（“质”）所决定的；“虎豹无文，则鞶同犬羊；犀兕有皮，而色资丹漆，质待文也。”这是比喻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来表现。在文、质并重的前提下，他并不把二者同等看待：“夫铅黛所以饰容，而盼倩生于淑姿；文采所以饰言，而辩丽本于情性。”归根到底，文章的美好（“辩丽”）不是取决于它的形式（“文采”），而是取决于它的内容（“情性”）。由此他得出结论说：“故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；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，此立文之本源也。”他主张由“经正”导致“纬成”，由“理定”达到“辞畅”，要求内容和形式像经线和纬线一样有机地组织成一个整体，这种辩证的观点贯彻在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中。

根据这个原则，刘勰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：“盖风雅之兴，志思蓄愤，而吟咏情性，以讽其上，此为情而造文也；诸子之徒，心非郁陶，苟驰夸饰，鬻声钓世，此为文而造情也。”这虽然是总结历史经验，实际是针对当时文坛而发，因为“后之作者，采滥忽真，远弃风雅，近师辞赋，故体情之制日疏，逐文之篇愈盛”。因此，他着重批判了重形式、轻内容的倾向：“是以联辞结采，将欲明理；采滥辞诡，

则心理愈翳。”这表明《文心雕龙》对当时的浮艳文风是一种挑战。

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,刘勰主张既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学规律,又根据现实的情况加以创新。

《通变篇》说:“名理有常,体必资于故实。”这是就继承而言,各种文体有一定的写作规格,需要通过借鉴前人的作品来掌握;“通变无方,数必酌于新声”,这是就创新而言,临文时的变化无穷,要依靠作者的独创性来实现。只要正确处理“通”(继承)和“变”(创新)的关系,“望今制奇,参古定法”,在规律中求变化,在继承中求创新,就能“骋无穷之路,饮不竭之源”,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。所以他说:“变则可久,通则不乏。”把“通”和“变”看作是保证文学发展“日新其业”的重要规律,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。

刘勰的文学史观不是停滞的,而是发展的。他提倡“趋时必果,乘机无怯”的变革精神,称赞“古来辞人,异代接武,莫不参伍以相变,因革以为功”(《物色》)的实践。他看到了文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:“黄唐淳而质,虞夏质而辨,商周丽而雅,楚汉侈而艳,魏晋浅而绮,宋初讹而新。”可是这种“踵事增华”的演变却引起了他的忧虑:“从质及讹,弥近弥澹,何则?竞今疏古,风末气衰也。”这种忧虑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:一方面,表现了刘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的不满:“今才颖之士,刻意学文,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,虽古今备阅,然近附而远疏矣。”另一

方面，也流露出某种复古的倾向。这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。所以他开出矫正时弊的药方，却是“矫讹翻浅，还宗经诰”，这当然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。

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，他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现，要求作家通过加强学习来培养高尚的风格。

《体性篇》从纷纭繁多的文学作品中，归纳出八种基本的文章风格，即“八体”：“一曰典雅，二曰远奥，三曰精约，四曰显附，五曰繁缛，六曰壮丽，七曰新奇，八曰轻靡。”为什么会呈现这缤纷多采的种种风格呢？他认为来源于作家不同的个性：“故辞理庸俊，莫能翻其才；风趣刚柔，宁或改其气；事义浅深，未闻乖其学；体式雅郑，鲜有反其习。各师成心，其异如面。”一句话，风格即人。这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风格论，对后代风格论起过开源导流的作用。

刘勰把作家个性归结为才、气、学、习四个方面，其中既有先天的禀赋，也有后天的习染：“然才有庸俊，气有刚柔，学有浅深，习有雅郑，并情性所铄，陶染所凝。”才和气是情性所铄，属于先天的禀赋；学和习是陶染所凝，属于后天的习染。刘勰虽然也强调作家的天赋，但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，而是把后天的学习提到重要的地位：“夫才有天资，学慎始习，斲梓染丝，功在初化，器成彩定，难可翻移。”因此从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学习，对形成高尚的风格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这种强调学习的踏实学风，贯穿于《文心雕龙》全书。《事类篇》说：“才自内发，学以外成。”